政治科學論叢／第五十二期／民國 101 年 6 月／頁 1～42

孫中山思想、民國百年與兩岸發展模式
一個總體的分析架構

吳玉山*

摘　要

對於民國百年的回顧，如果只是看在大陸的前四十年、或在台灣的威權時期，或是最後二十年的民主化與民主鞏固，都不能窺見這百年的全貌。本文試圖以中華民國百年發展的眼光，統觀民國第一個世紀的三個時期，並提供一個理論的系絡，點出發展與轉型的機制，以宏觀地掌握歷史的脈動。觀察的對象有三個：孫中山的主張、中華民國的實踐，與中國大陸在 1949 年以後的發展。這三個對象，在不同的時期當中，一共產生了七個不同的觀察點，座落在由國家的政治支配力和國家的經濟支配力爲兩軸所構成的平面圖上。不同的國家政治支配力產生了自由民主、現代化威權，和極權主義等三種體制；而不同的國家經濟支配力則產生了市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等三種產權結構和經濟體制。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搭配產生了九種政經制度組合，提供了現代中國發展七個觀察點的定位指標。國家政經支配力相稱的體制較爲穩定，其次是政高經低的體制，而最難以出現與維持的是政低經高的體制。孫中山的思想是由民主國家資本主義轉移到威權國家資本主義（但最終理想點未變）；中華民國是由有限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大陸時期）轉化到完全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民主化前的台灣），再轉型到民主市場資本主義（民主化後的台灣）；而中國大陸在 1949 年之後則

*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兼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
E-mail: yushanwu@gate.sinica.edu.tw。
收稿日期：100 年 9 月 26 日；通過日期：101 年 3 月 24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由極權國家社會主義（毛澤東時期）逐漸轉型到後極權的國家資本主義（後毛、後天安門時期）。由於政高經低，當今中國大陸的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有相當的制度韌性，已經成功地度過了多次政經危機。在孫中山的後期思想、中華民國的第二階段（威權台灣），和大陸的後天安門時期之間出現了制度趨同的現象，也就是中國大陸已經走入了台灣的過去。至於未來兩岸之間是否會出現進一步的制度趨同，則繫於中國大陸國力發展和制度變遷之間的相對速度。

關鍵詞：中華民國、孫中山思想、兩岸關係、制度匯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公元 2011 年是民國百年，代表在 1912 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即將進入第二個世紀。中華民國的歷史發展有兩個階段，前四十年位於中國大陸，後六十年則身處台灣。在台灣的階段又可以民主化作爲分水嶺劃分爲兩個時期：前四十年是威權統治，後二十年是民主政治。對於民國百年的回顧，如果只是看在大陸的前四十年、或在台灣的威權時期，或是最後二十年的民主化與民主鞏固，都不能窺見民國百年的全貌，而只是片貌。本文試圖以中華民國百年發展的眼光，統觀民國第一個世紀的三個時期，並提供一個理論的系絡，點出發展與轉型的機制，希望能宏觀地掌握歷史的脈動。

中國共產黨與其所建立的政權就像是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鏡射，相互對應而方向相反、此消彼長。中共從 1921 年成立後主要就是做爲中華民國境內的武裝反對力量，受到國民政府的壓制長達二十年。然而從 1949 年開始主客易位，中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控全大陸，而中華民國則敗走台灣。中共政權在 1949 年後也經歷了兩個階段：前三十年是毛澤東的革命狂飆，後三十年則是改革開放。同樣地，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解也不能夠只看前半期的大躍進與文革，或是只看後半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中國模式」，而必須前後兼顧。

爲何對於中華民國的百年回顧要牽扯到對岸？這是因爲中華民國從來就是以全中國做爲場景，並與對岸互動影響。中華民國的歷史發展是和中共的歷史發展環扣在一起的，雖然二者間的關係經常充滿了緊張與衝突。然而更爲重要的，是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可以拿我們用以分析民國百年的理論和眼光來加以理解，這樣就使得分析可以更具比較性與更加深入。

中華民國百年來顛簸而行，受到環境很大的限制，實踐理想的場域頗爲拘束，但是始終受到國父孫中山思想的影響。由於受到客觀形勢的限制，因此在理想和實踐之間出現了相當的落差；另一方面在國家的制度與政策當中，還是可以看到中山思想的形影。在對岸，孫中山被認爲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王朝，再加上他晚年聯俄容共的政策，使其享有相當高的評價。這位兩岸共同尊崇的人物，在肇建民國的時期，對國家的發展有相當明晰的看法。這些看法，也可以放置到我們分析兩岸實踐的框架當中來加以理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華民國的政治實踐是隨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動的，對岸的政治發展也是如此，甚至孫中山的想法也隨著他處身時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一旦我們把中華民國的實踐、中國大陸的發展，與孫中山的主張放置到同樣的一個概念架構當中，標誌出它們的個別位置，並且描繪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些標點是如何移動，則三者間的相互關係便顯露出來了。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發展出一個宏觀的概念架構，大筆勾勒出百年中國與兩岸的制度變動，試圖描摩歷史發展的軌跡。在結論當中，我們將以過去的經驗作爲參考，推想大陸體制變遷的發展方向，兩岸制度趨同的可能性，以及孫中山的理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討論的過程中，雖然會涉及孫中山思想、中華民國政經制度，以及中國大陸體制變遷的動因，但是本文的主軸還是歸結百年歷史，提供一個鳥瞰過去中國與兩岸制度變遷的視角，觀察三者間是否有趨同的傾向，而不是總結和歸納歷史的規律，那一部份將有賴後續的研究。

概念架構

在現代史當中，中國原是一個顢頇老大的農業帝國，也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受到西方強勢文明的衝擊，被迫做出反應，成爲後發國家（late developer）之一（Kopstein and Lichbach, 2005: 11）。後發國家對於來自國際的挑戰所採取的反應模式有其限制，多半是模仿先發國家（early developer）的制度設計，或是爲了快速追趕而加重國家的角色（Gerschenkron, 1962）。這些可供後發國家採行的制度模式可以用兩個面向加以區分：政權型態與產權結構（吳玉山，1996：193）。前者可概分爲三型：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現代化威權（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ism）與極權體制（totalitarianism）。這三種政權型態彼此的區別主要是在於國家對社會的獨立性與恣意行使權力的能力。在這兩方面都是極權體制高於現代化威權政體、而威權政體又高於自由民主制度。[1] 在產權結構的面向我們也可以

[1] Juan Linz 與 Alfred C. Stepan (1996) 將傳統的政權三分法加上後極權威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與蘇丹式政權（sultanistic regimes），而成爲五種政權型態。在本文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分三種類型：市場資本主義（market capitalism）、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與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這三種體制的主要差別是國家介入經濟活動的程度：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介入最深、國家資本主義次之，市場資本主義則又更淺。[2] 在由三種政權型態與三種產權結構所形成的架構圖中，我們可以標示不同的後興國家的制度抉擇。

自由民主體制與極權政體是相互對立的兩個極端，前者具有多數的獨立政黨，並在政治自由的保障下進行公平競爭，後者則僅有一個壟斷權力的全能政黨，對人民的行爲進行全面控制，也就是「權力集中到無限、又擴充到無限」，完全不存在多黨競爭。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便是威權主義；就後發國家的選擇模式而言，便是現代化威權主義。這樣的體制可以有多種形貌，其主要的目的都是集中政治權力到一個單一的政治權威（政黨、軍方、或王室），多黨雖然形式上存在，但是都無法挑戰支配性政黨的權威；政治環境受到各種限制，因此並無公平的政黨競爭可言。總體而言，是否有多個獨立政黨的存在，與是否有公平的政治競爭環境，是兩個主要的區別政治體制的判準。前者有關於是否存在獨立於國家的政治行爲者，後者有關於它們的行動環境。

獨立行動者的有無和行動環境的自由與否也可以用來區別不同的經濟制度。在國家社會主義的體制下，基本上生產工具由國家擁有（公有制），因此只有單一的經濟行爲者。經濟官僚是國家的代理人，他們所做出的生產、交換與分配的決定是依據國家的計畫與上級的指令，而不是爲了在市

後極權威權主義被視爲一種特殊的威權主義，而蘇丹式政權並非後發國家可以選擇的發展模式，而是特定模式與高度家族式的統治型態相結合所形成的現象，例如羅馬尼亞的喬賽斯古（Nicolae Ceauşescu）政權的「一家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Family）便是。在其他重要的政體分類方式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等，將各國的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綜合計算，並轉化爲 1～7 的評分，其中 1～2.5 爲自由、3～5 爲部分自由、5.5～7 爲不自由。自由之家又依據各國是否滿足基本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來決定該國是否爲「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Freedom House, 2011: 30）。此種政體的分類方式固然較爲精確，但是無法具體地掌握各種政體的主要特徵。因此在本文當中，還是沿襲傳統的極權、威權與民主三分法。

2 在國家社會主義當中，又有許多次分類，包括統制經濟（command or centrally-planned economy）、毛式社會主義（Maoist socialism）、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上透過自由競爭來爭取企業的利潤。在這種制度下只有一個行爲者，並且完全缺乏競爭性的行爲。相反地，在市場資本主義之下，基本上生產工具掌握在私人手中，市場則扮演主要的協調機制，透過價格訊號，引導生產者追逐最大的利潤。不但獨立的行爲者眾多，而且他們有行動自由，從事自主的競爭行爲。國家資本主義一如政治上的現代化威權體制，是一種中間的選項。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下，基本上生產工具是私有的，但是在所有人運用資產時，會面對國家所設定的各種誘因和限制，以調控和引導產業發展的方向。[3]

上述六種政權型態與產權結構都是屬於理念型，因此在各國的實踐當中會出現各種混合或中間種類，不過它們仍然是很有用的分類概念。爲了標誌清晰，我們將自由民主、現代化威權政體、與極權體制分別標誌爲政權類型 1.0、2.0、與 3.0；又將市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標誌爲經濟制度 1.0、2.0、與 3.0。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九種政經制度的組合，並且在現實國家實踐當中找到事例。在這兩類的指標當中，都是以數字大小來表示國家支配的程度，因此政治的極權主義搭配上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3.0, 3.0）是國家支配力最大的組合，而政治的自由民主搭配上經濟的市場資本主義（1.0, 1.0）則是國家支配力最小的組合，其他的七項組合則介於其中。[4]

3　固然任何國家都會採取各種總體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特別是當執政者奉行凱恩斯主義之時，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所主張的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深入到個別的產業、甚至是企業，產生了「挑選贏家」的效果，這和奉行市場資本主義國家所堅持的公平競爭、與總體經濟政策不偏厚個別產業或企業有所不同。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產業政策的權威詮釋，參見 Johnson (1982；1985)。

4　這九類可能的組合包括制度代碼（1.0, 1.0）的「民主市場資本主義」（democratic market capitalism）、（1.0, 2.0）的「民主國家資本主義」（democratic state capitalism）、（1.0, 3.0）的「民主國家社會主義」（democratic state socialism）、（2.0, 1.0）的「威權市場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market capitalism）、（2.0, 2.0）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state capitalism）、（2.0, 3.0）的「威權國家社會主義」（authoritarian state socialism）、（3.0, 1.0）的「極權市場資本主義」（totalitarian market capitalism）、（3.0, 2.0）的「極權國家資本主義」（totalitarian state capitalism），與（3.0, 3.0）的「極權國家社會主義」（totalitarian state socialism）。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表 1　後興國家發展模式的理念型

	市場資本主義 1.0	國家資本主義 2.0	國家社會主義 3.0
極權體制 3.0	極權市場資本主義 （3.0, 1.0） n/a	極權國家資本主義* （3.0, 2.0）	極權國家社會主義 （3.0, 3.0）
現代化威權 2.0	威權市場資本主義* （2.0, 1.0）	威權國家資本主義 （2.0, 2.0）	威權國家社會主義 （2.0, 3.0） n/a
自由民主 1.0	民主市場資本主義 （1.0, 1.0）	民主國家資本主義* （1.0, 2.0）	民主國家社會主義 （1.0, 3.0） n/a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各項政經制度的組合當中，有三類是難以發現經驗事例的。這三類包括極權的市場資本主義（3.0, 1.0）、威權的國家社會主義（2.0, 3.0）與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1.0, 3.0）。[5] 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配具有若干的相關性，因此最高的政治支配和最低的經濟支配（極權的市場資本主義）、與最低的政治支配和最高的經濟支配（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這兩種組合都難以出現。另外以本文所定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形式（公有制與計畫），只有在極權主義的全能國家之下才可能出現，即使是威權政體也無法支撐這樣高度管控的經濟制度，因此（2.0, 3.0）爲空集合（在表 1 中以 n/a 標示）。

在有經驗事例的六類組合當中，其中三類滿足國家在政治與經濟面向具有相符合的支配力，它們是民主市場資本主義（1.0, 1.0）、威權國家資本主義（2.0, 2.0）、與極權國家社會主義（3.0, 3.0）（在表 1 中以方框標示）。另外三類則是屬於混合型，也就是其國家的政治支配力與經濟支配力並不相稱，但也都能夠找到經驗事例。它們包括了威權市場資本主義（2.0,

[5] 民主自由和國家社會主義難以相容是許多古典政治經濟學者所共認的，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海耶克在其名著 *The Road to Serfdom* 中所闡述的立場（Hayek, 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極權國家資本主義（3.0, 2.0）、與民主國家資本主義（1.0, 2.0）（在表 1 中以星號標示）。[6]

在運用政經制度模式的類型學來檢視中華民國的發展經驗、對岸的制度變遷，和孫中山的建國理念前，我們可以先提出一些後興國家的經驗事例。在 Carl J. Friedrich 和 Zbigniew K. Brzezinski (1956) 對極權主義的經典描述當中，提到了最著名的兩個例子，一爲納粹德國、一爲蘇聯。雖然這兩個國家都大體符合 Friedrich 和 Brzezinski 所說的極權主義症候群，即烏托邦的意識型態、至高無上的領袖、全能的黨、對武力的壟斷、對經濟的宰制、對政治傳播的掌控，與恐怖統治，但是二者還是有所不同。它們最大的相異處便是納粹非社會主義者，他們要求掌控經濟但不要求直接擁有生產工具。私有制對希特勒而言不是罪惡，沒有廢除的理由，反而有和資本家進行合作的必要。德國爲了整軍經武以及進行戰爭必須將經濟生產置於國家計畫的詳細管控之下，但是希特勒及其黨人可以容忍私有財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納粹德國是極權的國家資本主義（3.0, 2.0）。至於蘇聯，則由於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便大規模地進行生產工具社會化，相當程度上消滅了私有制，同時推動計畫經濟，因此是極權的國家社會主義（3.0, 3.0），而與納粹德國不同。至於日本在戰前和二次大戰期間所採行的政經體制，其國家支配力較納粹德國又更弱一級。雖然在經濟上也是奉行國家資本主義，推動計畫經濟又容忍資本主義，但是在政治上日本的天皇體系並未造成所有權力集於一人，其動員社會的能力也和標準的極權主義國家有所差距，因此戰前與戰間的日本是威權的國家資本主義（2.0, 2.0）。[7] 到了戰後，日本在美軍的佔領下被迫民主化，但是經濟官僚仍然大權在握。他們抓住全民切望經濟復興的契機，以及有利的國際環境，以優秀的產業

6　在這裡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來，高政治控制與低經濟控制的組合比起低政治控制與高經濟控制的組合較爲可行，這是因爲國家一定的政治控制能力是施行經濟控制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唯一不存在經驗事例的高政治、低經濟選項是極權市場資本主義。然而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除了政經制度差距過大之外，主要還是因爲極權主義的定義中便包含了國家對於經濟的掌控。

7　戰前日本的兵變頻仍，下級軍官不服從上級，軍人不服從文人政府，高級軍官名義上受天皇號令，但天皇本人又不能眞正掌控大局，因此在其政治體系當中缺乏極權主義所必需的絕對獨裁者，如史達林與希特勒之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策推動了日本的經濟奇蹟。這就成爲民主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1.0, 2.0）。以 Chalmers Johnson 的說法，便是資本主義發展國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CDS），或是東亞模式。然而日本經濟發展的成功也帶來了內在與外在的壓力，結果在 1970 年代之後，CDS 模式無法持續，日本朝向經濟自由化方向發展，逐漸轉入了民主市場資本主義的政經體制組合（1.0, 1.0）。最後一種的組合形態是威權市場資本主義（2.0, 1.0），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時代的智利（1973～1990），他採取了芝加哥學派（Chicago Boys）的新保守主義經濟政策，崇尚私有財產與自由市場，搭配軍事獨裁政權的威權體制，推動了智利的經濟發展。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戰後的香港，以殖民地的威權統治方式，搭配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產生了另外一個威權市場資本主義的事例。各種發展模式的經驗事例，我們歸類在表 2 當中。

從各種理念型和經驗事例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家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的支配力是頗爲相關的。因此政經雙高（極權國家社會主義）、雙中（威權國家資本主義）、與雙低（民主市場資本主義）的制度搭配都有內在的一致性與清楚的事例。如果以 P 表示國家在政治場域支配力的高低，而依民主、威權、與極權分別給予 1 到 3 的分數（也就是與各種政權型態的命名相同），又以 E 表示國家在經濟場域支配力的高低，而依市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分別給予 1 到 3 的分數（也就是與各種產權結構的命名相同），則 P – E = 0 的三種類型是較爲穩定的。當政高經低（極權市場資本主義）或政低經高（民主國家社會主義）時（亦即當絕對值｜P – E｜= 2），則有內在的矛盾性與缺乏經驗事例。在政經制度不完全一致、但又不至於相差懸殊的混合體制當中（亦即當｜P – E｜= 1），極權國家資本主義、威權市場資本主義、與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均有事例，僅有威權國家社會主義缺乏實踐，顯示在政經制度不一致的情況下，國家支配性較高的政治制度尚可搭配國家支配性較低的經濟制度，但是國家支配性較低的政治體制卻難以搭配國家支配性較高的經濟體制。在這裡唯一的例外是以戰後日本爲代表的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可是如果我們瞭解日本在戰後長期由自民黨執政的五五體制其實是一種「軟性威權」的話，也就能夠體認它與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相合性。在此我們可以將日本的五五體

淡江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視爲國家政治支配力比一般民主政體爲強的特殊制度，而給予 1.5 的分數，則日本在 1950 到 1970 年代間的｜P－E｜= 0.5，這是代表政經制度的貼近，也使得國家支配性較低的政治體制可以支撐國家支配性較高的經濟體制。[8]

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把孫中山的理念、中華民國的百年發展、中國大陸在 1949 年後的進程、和兩岸的比較都放在後興國家發展模式的框架中來理解，並探索兩岸制度匯合的可能。

表 2　後興國家發展模式的事例

	市場資本主義 1.0	國家資本主義 2.0	國家社會主義 3.0
極權體制 3.0	n/a ｜P－E｜= 2	納粹德國* ｜P－E｜= 1	蘇聯 ｜P－E｜= 0
現代化威權 2.0	智利* 香港* ｜P－E｜= 1	戰前日本 ｜P－E｜= 0	n/a ｜P－E｜= 1
自由民主 1.0	戰後日本（2） ｜P－E｜= 0	戰後日本（1）* ｜P－E｜= 0.5	n/a ｜P－E｜=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孫中山的理念

在滿清覆亡、中華民國肇建的初期，橫在中國面前最緊要的任務，是如何選擇現代化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英美等現代化的先行國家擊敗了後興的德國，彰顯了民主市場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但是離中國最近、現代化最成功的亞洲新興強國日本卻是採取了現代化威權主義與國

8　由這裡也可以看出來當自民黨政權逐漸失去一黨獨大的力量，甚至出現政黨輪替狀況的時候，軟性威權便無法持續，國家的政治支配力逐漸降低，而其經濟支配力也就無以爲繼，此時國家資本主義的各項政策便必須改弦更張。具體地來說，便是自民黨政權無法繼續爲經濟官僚提供保護傘，使其能獨立於各種社會的利益團體，而推動追求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關於日本的軟性威權主義，參見 Johnson (19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資本主義的搭配，而展現了崛起強國的姿態。在一次大戰中解體的俄羅斯帝國被意識型態昂揚的蘇聯所取代，又另外提出了極權國家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路徑，雖然在當時此種模式的真實樣貌並沒有清楚地顯現，而是主要展示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理想性面貌。對中國的謀國之士而言，現代化的任務無可避免，而三條現代化的路徑也已經清楚地出現。要仿效歐美走民主市場資本主義、學習日本走威權國家資本主義、還是向蘇聯取經走極權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呢？

對國民黨的創建者與思想家孫中山而言，三條道路都是他有意探索的。他的原初理想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體制，並且以英美爲師，希望能透過政黨間的良性競爭來推動國家進步。[9] 在經濟上則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爲主，但是也帶有溫和的社會主義傾向，[10] 同時主張對外開放。[11] 孫中山的

---

9 孫中山所擬想的良性政黨競爭包括了幾個要素：和平而非武力、政見而非意氣、均以國家爲本位而非僅爲一黨之私利。這樣的文明黨爭在民國初年是不存在的（徐思彥，2000）。關於孫中山在初期受英美政治的影響，參見 Schiffrin (1970)。

10 孫中山對於經濟的主張是民生主義，其一切著眼點是人民的生計。雖然他多次提及民生主義便是社會主義，或是國家社會主義，但是仔細觀其內容，是取民生主義含括了社會主義的理想，能爲大眾造福，而不是僅利少數資本家而已。民生主義的要旨，是在當時中國產業不發達的情況之下，儘速推動經濟發展，但又考慮歐美資本主義已經帶來巨大的貧富懸殊與社會問題，因此未雨綢繆，試圖對私人資本有所節制（即取工業革命之善果，而避其惡果）。不論發達經濟或是節制資本主義，都是靠國家主動，表示國家將使用各種手段，以調控國民經濟。另一方面，除壟斷性的大產業之外，孫中山並無防阻私人資本之意。甚至由於中國缺乏國內資本，他還極力地尋求外資投入中國的基礎建設，特別是鐵路。他對私人資本，有防範一旦過大對人民生計可能會有不利影響的考慮，但是由於不接受馬克思強調階級鬥爭的唯物史觀與勞動價值和剩餘價值等學說，因此並沒有對私有制與私人僱佣本身的排斥，或道德的批判（黃明同、盧昌健，1996：68；姜新立，1998：3-8；王曉波，2003：96-106）。私有產權還是經濟的基礎，只是在必要之處應予限制。因此幾個民生主義的產權主張，包括「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都是站在私有產權的基礎上說的，也就是先認可私有制，而後再予以節制、平均與分配（李國鼎，1995：18）。這樣的基本思想架構，自然便導引出國家直接掌控制高點（例如鐵路、港口、金融），並開發及調控私有經濟的總體主張。在本文的定義中，這便是國家資本主義。孫中山忻慕德國俾斯麥的社會福利政策，又肯定列寧從「戰時共產主義」退卻下來而採取的「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爲在這兩個事例當中，國家都是掌握了制高點，並由此調控以私有制爲主的國民經濟本體。在有關於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比較上，台灣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思想在眼見民國遭遇到一連串的危機和挫敗（袁氏帝制、張勳復辟、軍閥混戰）之後，發生了轉變。中國顯然還不具備馬上實行民主的條件（Linebarger, 1973: 211）。他體認到蘇聯的黨國體制在實現革命目標上是有用的工具，而莫斯科在國際政治上也可以作爲抗衡西方帝國主義的依託。[12] 這便是「聯俄容共」政策的張本。爲了結束從袁世凱開始的軍閥政治，他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理論，爲國民黨以武力掃除反側、建立以黨治國的政治體制提供了藍圖。[13] 他也向蘇聯取經，開始打造國民黨自己的黨國機器，並建立了以他的學說爲中心思想的國民革命軍。這些作爲讓國民黨當時的制度偏好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然而雖然從以英美爲師轉而以俄爲師，孫中山並沒有要建立共黨式的極權體制。他所擬

學者多主張其相異處（廖斗星，1969；張益弘，1997；陳濟民，1973；葉尚志，1976；牛廣泰，1982：第 4 章；李玉彬，1974），而大陸的學者多主張其相同處（韋傑廷，1991；黃彥編註，2008）。不過總體說來，對共產黨人而言，孫中山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先行者，而非社會主義者。這樣的定性是從列寧時代便開始的（Gregor, 2007: 148）。

11　孫中山對外開放的主張，最顯著地體現在他的全面利用外資政策。參見徐高阮（1963），王爾敏（2011：289-310）。

12　民國成立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的蠶食鯨吞並未稍戢，而對孫中山的革命大業也缺乏支持的熱忱。此一現實也迫使孫中山轉向。參見 Bergère (1998: 314)。

13　在同盟會的時期，孫中山提出了革命的程序分爲「軍法之治」、「約法之治」，與「憲法之治」。這一部份主張在民初的國民黨時期被暫時凍結，到了中華革命黨時期再被提出，成爲「軍政時期」、「訓政時期」與「憲政時期」的建國三階段論。原先「軍法之治」與「約法之治」各爲三年與六年，到了「中華革命黨總綱」與「孫文學說」發表時，則給予更大的時間彈性，並強調從革命軍起義至憲法頒佈，一切軍國庶政皆歸黨管，也就是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這樣的主張，一直到中國國民黨時期（1919～）都始終堅持。在孫中山過世的前一年（1924），他還在「建國大綱」中重申了革命建國的三階段論。基本上，當革命建國的情勢較爲樂觀，有可能依循西方模式推動民主政治時，孫中山便不提階段論，並同意國民黨以一普通政黨的身份與其他政黨進行民主競爭。然而當革命建國面臨極大險阻時，孫中山便強調階段論的重要，並且將國民黨還原成革命政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因此在外在局勢、建國階段論、和國民黨的屬性間有一定的聯繫（孫治民，1984：第 4 章）。不過雖然孫中山強調民主必須依階段循序漸進，不可一步到位，但是不論軍政、訓政、還是憲政都是以實行民主爲依歸的，軍政是掃除民主的障礙，訓政是在地方推行民主化，而憲政則是在全國的範圍進行民主化，建立自由民主的體制（陳儀深，1985：第 5 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想的是在行憲之前先以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完成國家的統一，而後透過政治教育讓中國人熟悉民主，此時國民黨暫代人民行使政權。此種工具式與暫時性的權力壟斷僅能提供階段性的威權統治的基礎，而與蘇聯共黨的極權政體有很大的不同。

在表 3 當中，我們標誌了孫中山的思想位置。孫中山思想（1）是指孫中山初期的制度偏好，他當時主張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也就是在（1.0, 2.0）的位置。在受到民國危殆的衝擊之後，孫中山的政治制度偏好轉向較高的國家支配，雖然以俄爲師，但是並沒有提高到極權主義，而是處於現代化威權主義的階段，至於經濟制度則是維持國家資本主義的偏好，因此孫中山思想（2）的政經制度搭配是出現在（2.0, 2.0）的位置。從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到威權國家資本主義的轉變，反映的不是孫中山終極理想的改變，而是策略與手段的調整。對孫中山而言，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始終是其最終偏好，只是需要經過一定的階段與過程，才能夠切實地達成。這樣的觀點也烙印在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型態當中，使威權主義在其中始終只有手段的價值，這對於中華民國日後的民主化轉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表 3　現代中國的發展模式

	市場資本主義 1.0	國家資本主義 2.0	國家社會主義 3.0
極權體制 3.0			中共政權（1）
現代化威權 2.0		孫中山思想（2） 中華民國　（1） 中華民國　（2） 中共政權　（2）	
自由民主 1.0	中華民國（3）	孫中山思想（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華民國的發展

在北伐完成之前，中華民國缺乏一個明確的領導核心，洪憲帝制、張勳復辟、軍閥戰爭等動亂頻仍，因此無法建立穩定的政治制度與推動經濟發展。在蔣中正領導的北伐軍形式上統一全國之後，雖然中央的實質統治區域仍然有限，但是南京政府持續進行建立國家（state building）的工程，國民黨以黨領政的訓政體制逐漸確立，經濟建設也展露出初步的成果，這就是所謂的「黃金十年」（1927～1937）。在這個階段，國民黨政府所奉行的是威權政治和國家資本主義，並不容許其他的政黨挑戰其壟斷性的政治權力，也強調要由國家引領中國的經濟發展。[14] 雖然在這段時間當中仍然有中央與地方軍閥的戰事、對共黨根據地的 5 次圍剿、中日間的多次武裝衝突與喪權失地、在不平等條約下稅收的缺乏自主、各省對於中央的政治與經濟抵制等巨大的缺陷，但是中國的整體發展水平確實在抗戰爆發前達到最高點。此時中華民國（1）所採行的是現代化威權政體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也就是在（2.0, 2.0）的位置，這也是孫中山晚期理想點的所在。不過由於當時國家對於全國的實際控制有限，因此在制度座標上我們標爲（1.5, 1.5）。

八年的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路徑。由於將主要的國家資源投注於前線戰事，國民政府喪失了對於農村的控制，國共之間的權力對比發生了決定性的翻轉（Johnson, 1962）。陷於長期戰爭中的威權體制逐漸暴露出其內部腐敗的問題，而經濟凋敝與物資缺乏更直接影響到民眾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因此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已經再衰三竭，無法應付中共的挑戰。在接連的重大戰役失敗後，國民政府敗走台灣，在相對於大陸 1/266 的領土與 1/66 人口的基礎上重建政權。

---

[14] 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後，爲肆應國家進入訓政時期，國民政府在 1928 年 10 月制訂訓政綱領，到 1931 年 5 月又召開國民會議訂定訓政時期約法，爲訓政時期的臨時憲法，當時預定於 1936 年結束訓政時期，並制訂憲法，以正式進入憲政時期。但由於日軍侵華，向憲政轉型的過程暫時停止，迨抗戰勝利後才正式制訂憲法。故自 1928 年至 1948 年中國均處於訓政時期，由國民黨代行政權，以黨治國，並沒有多黨競爭的情況產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高度危機感的驅使之下，國民黨痛定思痛，徹底地檢討了在大陸失敗的原因。蔣中正對國民黨的統治機器進行了「改造」工程（1950～1952），其主要的思考路徑不是引入較多的自由民主以徹底行憲，而是加強政治與思想控制（Wu, 1994: 143）。這使得台灣的政治現實和行憲的許諾大相逕庭，而成爲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底下的戒嚴體制。雖然如此，在國民黨本身所奉行的意識型態、美國所支配的外在形勢，與有限的國家能力影響下，蔣中正並未試圖建立管控一切的極權制度，而是強化了既有的威權體制與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獨裁。[15] 另一方面，國民黨深切體認到經濟發展與穩定的重要性，是政權存亡的基礎，並認定國家必須扮演領導的角色。從 1950 到 1980 年代的中華民國（2）是改良版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在統一而安定的政治環境之下，由最高領袖授權不受西方經濟學說束縛的科技官僚放手發達產業，扶助私人資本成長。[16] 但是由國家掌握各種政策手段，調控經濟發展的方向與速度。[17] 也就是在所有權上鼓勵私有，但是在控制權上保留國家的制高點。[18] 結果台灣的經濟結構逐漸從戰後政府全盤接收日本產業時的統制經濟逐漸轉移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體系（Wu, 1994: ch. 5）。一整代的企業家在這種重商主義的環境之下成長茁壯，而國民黨也靠著高速的經濟發展增強了政權的合法性。到了 1970 年代台灣經過國家資本主義下

---

15 國民黨深受孫中山「建國大綱」的影響，在內戰失敗後將其在台灣的角色實質上定位爲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一方面推動地方自治，一方面由國民黨總攬政權，但其最終目的還是回歸憲政體制。從 1950 年改造案通過後，國民黨稱其本質爲「革命民主政黨」（李劍農，1980：616）。

16 在鼓勵民營企業的方面，美國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與美國對資本主義的偏好自然是相關的。參見李國鼎（2005：242）。

17 關於台灣科技官僚的背景與影響，早期可參見 Pang (1988；1990)，近期可參見瞿宛文（2009）。後者稱此類的科技官僚爲「儒官」。

18 這便是所謂的「計畫性自由經濟」，也就是在計畫的大原則之下，由政府決定國家介入市場活動的範圍和程度，以追求經濟社會的發展，並防止過度自由競爭的弊病（魏萼，1981：32-33），或可稱之爲「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魏萼，1993：19）。國家對於經濟計畫的執行，主要是透過間接手段，利用各種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槓桿來導引民營產業的發展，較少直接的行政干預（鄭竹園，1994：19）。不過和西方的凱恩斯主義不同的是，台灣的政府有清楚的產業政策，因此各種政策槓桿不僅是適用於總體經濟，更常以產業、或個別企業爲對象，而造成「選擇贏家」的結果。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的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接續日本而成爲東亞高速成長模式的一個新範例（Johnson, 1985）。[19] 總體而言，從 1949 年以後的在台灣重建的中華民國（2）和大陸時期（中華民國（1））比較起來增加了國家對於政治和經濟的控制力，因此成爲典型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2.0, 2.0）。

東亞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在發展上有其先天的限制。雖然國家在政治和經濟的面向上具有相符的支配力，但是由威權國家資本主義所驅動的高速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遷，以及對於威權統制的挑戰。這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成熟、利益的分殊、教育與知識的普及、中產階級的成長、與國際環境的影響，一方面更是由於經濟的發展促使人民追求超越溫飽的價值，與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20] 東亞的威權國家因此面臨騎虎難下的局面，它們成功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對威權體制最大的挑戰。在幾個典型的東亞發展國家當中，南韓與台灣進行了民主轉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也已經感受到反對力量不斷增強的壓力，[21] 而香港的民主發展雖然受限於作爲中國大陸一個特別行政區的身份，還是展現了相當的活力。[22] 一般而言，威權體制在驅動持續的高速經濟發展之後，經常無法抗拒社會要求多元與民主的壓力，而被迫妥協。台灣在此便是一個極爲典型的例子。

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由於強人過世、國際壓力紛至沓來、以及社會反對勢力不斷增長，台灣開始民主轉型。在這段時期執政當局廢除了戒嚴體制，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解除了黨禁報禁，於是中華民國開始進入自由民主、多黨競爭的政治局面，一如「現代化理論」與「意識型態終結論」所預示的情況。相對應於政治的鬆綁，在經濟上也出

19　關於台灣作爲一個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站在肯定立場的如 Amsten (1979)，站在批評立場的可參見 Yongping Wu (2004)。

20　這樣的論述早期的代表是「政治現代化理論」，例如 Lipset (1981)；在蘇聯解體後最著名的是「意識型態終結論」（Fukuyama, 1992）。

21　在 2011 年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國會大選中大量喪失選票，其得票率從 2001 年的 75.3% 跌至 2011 年的 60.1%，這樣的支持率已經和國民黨在 1990 年代初期民主化發軔的時候類似。人民行動黨因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22　從 1989 年六四以來，香港的民主派持續活躍，而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極爲迅速，對香港特首和北京政府都經常構成壓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了結構的轉型，從 1990 年代開始，台灣的發展國家已經逐漸無法維繫，而這是和政治的民主化息息相關的。發展國家的政經體制需要滿足四個條件：第一、國家獨立於社會之上；第二、菁英具有發展主義的共識；第三、國家對社會的高度滲透能力；第四、順應世界市場的產業政策。從 1960 到 1980 年代，台灣的確滿足了這樣的四個條件，包括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戒嚴與黨禁，以及有限的地方選舉使得國家獨立於社會之上；爲了以高速經濟發展做爲重建政權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因此統治菁英具有發展主義的高度共識；黨國體系滲入農、漁、水利會、工商團體、工會組織與各種社會群體，實現了國家對於社會的滲透；而經濟官僚獲得高層的充分授權，利用台灣資源稟賦、瞄準世界產業趨勢，決定了極大化成長潛能、順應世界市場的產業政策。此種產業政策創造了加工出口區與工業園區，提供企業土地資源；推動了與產業緊密結合的教育政策，同時壓抑工會，創造了質優而價廉的勞力；藉著對金融的控制來提供指向型的資金補助、優惠貸款，與賦稅減免，引領策略型產業的發展；成立了技術研發機構，並從海外延攬人才回國，移轉科技到業界，提供了生產技術；並以外貿協會等政府機構協助廠商取得國際市場資訊，幫助產業發展。在這樣的發展國家架構之下，台灣從農產加工、紡織工業，一路發展到電子工業、重化工業，又連續進行進口取代與出口擴張，造就了經濟奇蹟。然而，也是在發展國家生產第一、出口掛帥的最高目標之下，台灣出現了高度的污染與對勞工的壓抑，產業雖然逐漸升級，但是無法擺脫世界生產鍊中中、下游的角色，並形成了對美國與日本的雙重依賴（Wu, 1997）。

這樣的結構雖然能夠抵擋兩次石油危機與新台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挑戰，但是在民主化之後卻逐漸難以維繫。[23] 從 1990 年代初期以來，國家的獨立性逐漸減弱，國會對政府的制衡（包括民進黨對國民黨政府的牽制、以及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朝小野大）不斷增加。[24] 在威權時期國民黨政府

[23] 台灣的國家對於經濟控制的放鬆是漸次出現的。在 1985 年所提出的「國際化、自由化」是經濟轉型的先聲，當時主要是受到美國的壓力，而集中於外貿部門，對於經濟整體的影響有限。眞正的改變是伴隨著民主化而來。

[24] 例如國民健康保險在選舉競爭中上路（1995 年），財務問題立即浮現。而提高保費、並強調公平性的二代健保方案在立法院中卻遲遲無法通過，一直到 2011 年才勉強通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經濟發展作爲最主要的合法性基礎。然而自李登輝擔任總統以後，民主與本土化成爲主要的意識型態訴求，政黨輪替後環保主義更爲抬頭。國民黨加強與地方派系利益相結，政府的政策也反應此種趨向，而民進黨執政後政商的連結依然綿密，主張發展主義的經濟官僚遂逐漸爲民選政治領袖所馴服。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滲透力也逐漸削弱。過去執行國家政策的工具，例如掌握意識型態的大眾傳播媒介，已經分殊多元，而強制性的工具（例如警總），也已經取消。[25] 最後，在台灣早期的發展階段中，指定策略型產業做爲國家主力扶植的對象相對容易，僅需參考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並利用台灣相對資源稟賦便可。然而在追趕（catch up）已經成功後，由於缺乏前人軌跡以資遵循，如何指定策略型產業便成爲重大問題，而科技官僚在決策上的地位也逐漸低落。[26] 相對於國家，企業和利益團體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市場成爲驅動與調節經濟發展的主要機制，台灣已經從國家資本主義的框架中脫出（Wu, 2007）。

民主化之後的中華民國在政治上走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經濟上也放棄了國家對於發展方向的主要掌控機制，因此不論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都降低了國家的控制程度，而從威權國家資本主義（2.0, 2.0）轉型成民主市場資本主義（1.0, 1.0）（參見表 3）。國家控制在政治和經濟兩個面向的同步向下是彼此相關的。較低層級的政治控制難以支撐較高層級的經濟控制。政治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一旦撼動了一黨統治的基石，便使得科技官僚失去最大的倚靠，而必須臣服於民選首長的政治權威。[27] 中華民國在

一個折衷的版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個政黨敢於得罪選民。又如 1992 年銀行改革與 1988 年證券交易法修正時政府均不顧保守財政官僚的反對，而採取有利於財團的政策，放寬設立銀行與證券交易商的規定。而二次金改中企業對於政府的滲透與影響、官商之間的勾結更清楚顯現出官僚的缺乏獨立性。

25　不論是 1990 年代的國民黨、或是執政後的民進黨，雖然都主張「戒急用忍」、「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保守性兩岸政策，但是都擋不住台商對大陸投資的大幅度增加，與台灣對大陸的進口與貿易依賴。例如在台灣生產主力的高科技產業中，筆電與 LCD 的生產已盡皆移至中國大陸。

26　例如政府已經指定生技產業爲台灣主要的策略型產業之一，但是該產業利潤回收期長、資本需求極鉅、先進國家競爭激烈、研究導向與知識密集特性明顯，是否適合台灣傾國家之力發展是大有疑問的。

27　在台灣財經的科技官僚當中，始終能夠維持獨立性並堅持專業理性的是中央銀行總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一點上並非特例。[28]

中共政權的發展

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是源於民國初年中國現代化的三條路徑之一，也就是蘇聯所代表的極權國家社會主義。在經歷了國共合作、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後，由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終於獲得了在中國大陸實現其建國理念的機會。在國民經濟初步恢復之後，中共立即推動蘇聯式的第一個五年計畫，試圖快速地重工業化。此一作法，嚴重地脫離了大陸的資源稟賦（張榮豐，2009：1-6）。由於缺乏資本、經濟成長趨緩，毛澤東遂發動了強調精神動員的大規模生產運動（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脫出了蘇聯的發展模式。在其後的二十年間，中國大陸就在毛氏的烏托邦運動路線和較爲現實的修正主義路線之間擺盪。路線矛盾和領導階層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相倚相隨，嚴重阻礙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雖然毛氏與蘇氏的發展路線有所不同，但是在消滅私有制與市場上仍然是一致的，也就是都服膺於國家社會主義。而中共在個人崇拜、恐怖統制、箝制思想、壟斷經濟等極權主義的各面向，也和蘇聯在史達林時期類似，或者更具毀滅性。[29] 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很清楚地採取了極權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3.0, 3.0）。

當毛在 1976 年過世時，大陸的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吳敬璉，

---

28 這與威權時期的傳統、國際經濟學說的潮流，與歷任央行總裁的竭力維護均有關連。因此南韓發展國家的式微也是出現於民主化的前後。關於這兩個發展國家的式微和比較，參見林文斌（2008）、Minns (2001)、Lim (2009)。關於仍然肯定東亞發展模式活力的看法，參見 Weiss (2003), Wong (2004)。

29 在比較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革命時，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Perry Anderson 在〈兩場革命〉中認爲中國和俄羅斯的共產革命不啻天差地別（Anderson 著，2011）。中國的革命爲今日的國勢昌盛、經濟騰飛奠定基礎，而 10 月革命所創造的蘇聯已經煙消雲散，後繼者俄羅斯則淪爲倚靠輸出原物料以存活。吳玉山（2011）卻認爲二者所創立的共產政權多所相似，在其不同之處反是蘇聯爲優。只有當兩者都試圖從社會主義（也就是革命的理想）脫出時，由於中共過去的慘痛經驗，因此在改革開放的路上走得更爲決斷，已經進入了東亞模式，而遠非蘇聯在其有限的改革進程中所能企及。因此正確的判斷是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上勝過中國，而中國則在脫離革命上勝過蘇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0a）。由於毛氏社會主義發展路線的缺陷極爲明顯，極左派在毛死後迅速失勢，主張回到蘇聯和東歐模式的官僚改革派與主張大幅度引進市場的激進改革派成爲主要的路線競爭者，在整個 1980 年代進行一波波的對抗，使得這一段早期的改革階段充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盪。[30] 當時主要的改革思潮基本上是環繞在「市場社會主義」的概念周圍，對於私有制的引入是「潛行」（creeping）的。同樣在這一段時期，由於戈巴契夫的倡導，共產國家出現了爭取民主的浪潮，因而在經濟改革之外，政治改革也被提到日程上來。雖然戈巴契夫的主要用意是利用開放性（*glasnost'*）與民主化（*demokratizatsia*）來調動社會支持，以打敗黨內的保守派，然後透過改革重建蘇聯的體制（*perestroika*），但是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各種長年被壓抑的族群與社會矛盾、和民眾對政治參與的要求一時併發，蘇聯僵化的制度無法承載，不旋踵即全面崩潰。[31] 與蘇聯緊密連結在一起的東歐各共產政權也隨之隕落，產生了第三波民主化中最突出的浪潮。中共也無法自外於共產集團的巨變，而在 1989 年產生了天安門事件。靠著強硬的鎮壓與清洗黨內的政治改革派，中共政權穩定了局面，沒有步上蘇聯和東歐的後塵。

對中共的領導階層而言，中國大陸在 1980 年代的改革經驗顯示，政治控制不能放鬆，而經濟改革還必須加速，以期使政權的棒子更大、而胡蘿蔔更多。由於前者，中共決定更加強黨的滲透能力，並加緊箝制輿論。至於後者，則首需壓制住保守派在天安門事件後的全面反撲，重啓並深化經濟改革，而這就是鄧小平「南巡」的背景。迨經濟改革重新啓動後，中共在意識型態上便突破了「引入市場、不改變公有制」的格局（也就是 1980 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而大膽地扶持私人資本發展。[32] 此一政策在經過

30　關於在 1980 年代中共路線、派系和改革週期的相互影響，參見 Dittmer & Wu (1995)，吳玉山（1996：第 3 章）。

31　關於蘇聯崩潰的經驗，參考吳玉山（1995）。

32　區別市場與資本主義是鄧小平於 1992 年南巡時重新啓動改革風潮的理論突破口，替深化經濟改革找到了意識型態上的有力辯護。但是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市場社會主義，而往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也就是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的時候，正是它在實踐上被超越的時候。關於市場與資本主義的區辨，參見歐陽日輝、李佳（2009：354-360）。

臺灣政治學會 期刊資料庫

二十年的推動後，已經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帶來了決定性的轉變。在後天安門時期，當局對國有制的堅持僅僅表現在各個「制高點」上（例如金融），其餘的部門都讓私有企業伸入，並大幅度地引進了國外的資本，也就是明確地從市場社會主義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從歷次經濟改革的主軸來看，一開始是邊際性地引入市場機制，然後是逐漸增加市場、取代計畫，最後是進入所有制改革的範疇，從容認私有制開始，到把公有制與私有制等量齊觀，強調公私協調合作。中共在十二大時（1982 年）提出了「以計畫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接下來就是「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十二屆三中全會，1984 年）、「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十三大，1987 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四大，1992 年）、「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十五大，1997 年），最後到「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且「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十六大，2002 年）。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共從允許「個體戶」、「私營企業」到「私有企業」，實質上一步步地放棄了對於公有制的堅持。除了名目上不再獨尊公有制之外，在實質上更透過硬化預算，在更大的範圍內（特別是在鄉鎮企業）達到了隱藏與實質的私有化。不過雖然一方面容許更大程度的私有化，中共政權在發展產業時卻完全沒有忘記國家領導的角色，並力圖透過操作各種市場參數來導引資本進入重點項目，並在生產因素的提供、基礎建設的安排、企業利潤的分配等方面盡力求取產業政策的實現。[33] 隨著非公有部門份額的持續擴大，和各種產業政策的擬定與落實，中國大陸已經越來越趨近東亞發展國家的模式，而和 1980 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吳玉山，1996：第 3 章；吳玉山，2011）。[34]

---

33 關於中國大陸在改革的過程中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參見王紹光、胡鞍鋼（2000：1-20）；王紹光（1994：19-32）。

34 在官方提法中，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主要仍然是 1992 年十四大所定調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反映了在官方意識型態上對社會主義的堅持，然而其實質內容已經不斷地朝私有制的方向發展。中共認爲其對社會主義的強調，就代表國家仍然在有意識、有計畫地調控經濟，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意義，已經從傳統的所有制轉移到控制權了。關於社會主義就代表國家有計畫的調控，參見劉國光（2010：586）。鄧小平對於「姓資」或「姓社」的判准更是籠統，他認爲只要能夠「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便是社會主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今日的中國大陸，在政治上仍然維持一黨專政，並且展現國家對於社會的強固控制能力，其制度基礎還是襲自蘇聯的黨國體制。但是由於在政治繼承上的種種改革，以及菁英之間競爭的規範化，使得中共政權制度化的程度增加，並展現了相當的專業性、流動性與穩定性（寇健文，2005）。此類的黨國體制並不會強制地動員社會投入政治、經濟或意識型態的運動，因而與往昔的極權主義不同；但是其對於反對勢力的防範、對於社會的滲透與控制，均較一般的威權主義政權爲強，因此是屬於「後極權主義」的範疇。以蘇東的經驗而言，後極權主義（或後史達林主義）的特色是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科技官僚統治，與消費主義。這些特徵是針對著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意識型態治國，和烏托邦主義而來。後極權主義爲政治生活帶來可預測性、增加了政策的科學理性，同時以滿足人們的物質利益來爭取他們對共黨政權的支持。簡言之，就是制度化、科學化和物質化。就國家的政治控制力而言，後極權主義超過威權主義。一般的威權主義國家缺乏滲入社會深層的統治機制，而後極權主義仍然保有這些機制，甚至當社會中出現有限的多元現象的時候，後極權的國家仍然牢牢掌控傳播媒體、堅持對於意識型態的詮釋權、高度涉入經濟與社會事務，並保有包絡整個社會的黨組織，對新生的社會領域進行滲入和控制。後極權的共黨對於獨立的社會團體保持高度敏感，不容許出現任何反對力量。這樣看起來，後極權主義是介於一般的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政治體系，在施行社會控制上，較強於一般威權主義（吳玉山，2011）。

如果要將今日的中共政權加以定性，可從政治與經濟兩面來看。在政治面向，由於後極權主義是介於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之間，因此可給予 2.5 分，而在搭配國家資本主義後，成爲「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或「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2.5, 2.0）。此一政經體制，是一個極爲特殊的混合體，表現在中共身上，成爲全世界最大的共產黨扶持著全世界發展最快的資本主義經濟，並以此鞏固本身的權威。在此一體系之下，雖然國家的

義（鄧小平，1993：372）。除了社會主義的定義內容有所改變之外，當然在學術圈與政策圈還是有許多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支持者，他們認爲私有制優於公有制的看法是謬誤的。參見崔之元（1997：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支配力和經濟支配力並不完全相稱，但是由於是政治支配力高於經濟的支配力，因此體系的穩定性還是較高的。

中國模式的討論

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迅速且持續性的發展，其規模已經超日趕美，成爲世界第二，並且極有可能在 21 世紀的上半葉成爲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自從鄧小平在 1970 年代末發動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經濟成功地度過了天安門事件、1997～98 年東亞金融危機、與 2008～09 年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不斷地發展升級，顯現了極爲強韌的適應能力，而成爲一種「中國奇蹟」（林毅夫、姚洋編，2006），其成效明顯地超過了同時進行經濟轉型的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與前蘇聯（Nolan, 1995）， 並且逐漸構成了對於傳統現代化理論的挑戰（趙穗生，2009；朱雲漢，2009）。在此種情況之下，對於「中國模式」甚至「北京共識」的討論自然甚囂塵上（趙劍英、吳波編，2010；鄭永年，2010b；潘維編，2009；江金權，2007；沈雲鎖、陳先奎，2007；丁學良，2011）。理論界與實務界都想要瞭解中國經濟持續迅猛發展的原因何在。這些討論大致可分爲秉賦條件與策略制度兩個部分。就前者而言，文化、國際環境與經濟發展階段是最常被提出的因素。[35] 就後者而言，經改的指導方針（經驗主義 vs. 理性主義）、改革的速度（漸進療法 vs. 震盪療法）、轉型的核心考慮（技術本位 vs. 利益本位）和制度結構（威權國家資本主義 vs. 新古典資本主義）是討論的焦點。[36] 由於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在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表現有巨大的差距，而其稟賦條

35 關於儒家文化和經濟表現之間的關連，參見黃光國（1988），劉小楓、林立偉編（1998），樊綱（1998）；關於國際環境的影響，參見吳玉山（1995：第 5 章）、吳玉山（1997：第 2 章）；關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參見吳玉山等（1995）。

36 關於經改指導哲學中經驗主義（摸著石頭過河）和理性主義（依據理論、一步到位）的對辯，參見 Murrell (1991)、盛洪（1995）；關於經改速度的討論，參見 Slay (1994)、吳敬璉等（1996）、王輝（1998）、Sachs and Woo (2000)、林毅夫（2004：36-48）；關於轉型的核心考慮，參見 Fischer and Gelb (1991)、Fischer et al. (1996)、樊綱（1995a; 1995b）；關於制度結構，參見 Oi (1992), Wu (1994: ch. 1), Wu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件並沒有產生如此大的變化，因此秉賦說一般不能夠提供有力的解釋。[37] 各方討論的重點還是在於策略制度的面向，而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主要內涵。[38]

對於中國模式討論最多的，當然是中國大陸的學者，或加上海外的中國學者。其中自然有對此一概念表示懷疑，認爲中國的發展經驗尚未形成模式，或者根本不存在；[39] 但是多數不但接受，而且肯定中國模式的重要價值。[40] 在中國模式的討論當中，涉及改革的指導方針（王紹光，2009）、

37　即使就秉賦條件中最容易變動的國際環境而言，也與中國大陸的改頭換面不相配合。從中共建政之初美國的試圖拉攏、1950 年代向蘇聯「一邊倒」、1960 年代的雙反政策（蘇修、美帝）、到 1970 年代與美國建立「統一戰線」來對抗蘇聯，中共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歷經多種變化，好壞都有，卻始終無法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顯見大陸國內因素的重要性。

38　相對於「中國模式」，由 Joshua Cooper Ramo 所提出的「北京共識」是一個針對新古典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華而不實的概念，而遭到多方的抨擊。關於北京共識的論述和批評，參見 Ramo (2004)、Hsu et al. (2011)、Zhao (2011)、Kennedy (2011)、Dickson (2011)。

39　例如俞可平認爲中國的現代化任務還沒有完成，「中國模式」並沒有定型（俞可平，2010）；吳敬璉以爲經濟危機期間中國政府所進行的強力宏觀調控造成退出的難度比西方更大，並不能構成世界仿效的榜樣（吳敬璉，2010b）；蕭功秦指出中國模式的核心是後全能主義帶領「強國家－弱社會」下的市場經濟轉型，但會產生低頻率、高強度的衝突，必須加以改革（蕭功秦，2010）；許紀霖提出中國僅達到富強的崛起，並沒有達到價值、制度和文明的崛起，也就是中國模式缺少一個普世性的文明證明（許紀霖，2010）；柯爾奈認爲中國模式無可仿效，因此並不存在，它又依靠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高儲蓄與投資率，以及帶來了自由的限制，因此凸顯了一種抉擇困境（柯爾奈，2010）；丁學良提出中國取得高速的經濟發展支付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包括公正問題、生態惡化，與行政成本，因此中國模式難以推廣（丁學良，2010）。

40　例如張維爲認爲中國模式顯示的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張維爲，2010）；童世駿指出中國模式是民族復興、現代化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組合，是獨一無二又影響深遠的（童世駿，2010）；鄧正來提出中國模式的精髓在於它是一種「生存性的智慧」（鄧正來，2010）；王紹光認爲中國表現出「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政治模式（王紹光，2010）；宋魯鄭認爲中國模式的要素是勤奮的人民與強勢的政府，結果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奇蹟（宋魯鄭，2010）；鄭永年指出中國模式的核心是經濟上採取混合制，政治上黨權集中而治權對社會開放（鄭永年，2010a）；史正富提出中國漸進改革有賴於地方政府佔突出角色的三元治理結構（史正富，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改革速度、轉型方式，與制度結構等各方面，而以制度結構最爲根本。一如當年關於東亞發展國家的討論，威權（後極權）的政治體制普遍被認爲對於中國大陸高速而持續的經濟成長帶來很大的貢獻（Johnson, 1982；蕭功秦，2010；鄭永年，2010a）。[41] 另一方面，國家對於經濟的積極調控也被視爲中國模式中一個極爲重要、不可或缺的因素（劉國光，2010），此點也和發展國家的文獻一樣（Johnson, 1985）。凡此均指向中國模式的核心便是「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或「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也就是蘇東黨國體系和東亞發展模式的揉合（吳玉山，2007）。中國模式在政治上和蘇東的後史達林體制類似（當然在政治制度化和解決政治繼承的問題上更爲進步），而在經濟上又和東亞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一致（當然在意識型態上還堅持其爲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42] 這是中共的制度根源和文化地理區位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形成中國模式的主要內涵。缺乏其中任何一項，便無法真切地掌握住中共的制度核心，和中國大陸 30 年來高速經濟發展的基礎。

模式的近似與匯合

在以同樣的概念架構解析了孫中山的理念、中華民國的歷史發展，與中國大陸在 1949 後的政經變遷後，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來探討這三者的相對位置和彼此間的關連。在圖 1 中我們將孫中山的理念演進、中華民國的發展，和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遷以標點和射線表示在以國家政治控制力和國家經濟控制力爲兩軸的平面圖上。Sun 1 代表孫中山以歐美爲師時期的思想，主張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和國家資本主義（1.0, 2.0），而 Sun

41 蕭功秦稱當代的中國政治體制爲「後全能」，並發展出有關後全能體制產生的背景、過程與影響的理論，參見蕭功秦（2008a：113-248）。他看到此種體制的正面價值，力主「新權威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力抗「政治浪漫主義」與「激進主義」，也就是反對在缺乏社會經濟基礎的情況下，過早的主張議會民主政治（蕭功秦，2008b；2001）。

42 關於贊成中國所採行的便是東亞經驗，參見 Baek (2005)；關於反對的意見，參見 Lee et al.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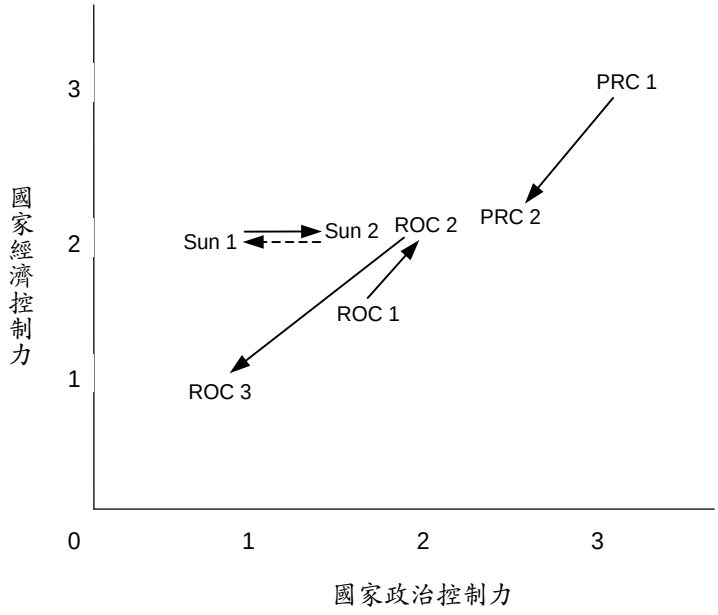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則代表後期孫中山在革命方略上以俄爲師的思想轉折，此時他主張以黨治國、爲人民代行政權，而在經濟發展上則維持原先的看法，這就使得 Sun 2 的標點落於（2.0, 2.0）的位置，也就是顯著地向右移動。不過由於孫中山的建國階段論還是以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做爲依歸，因此我們畫出了從 Sun 2 向 Sun 1 移動的虛線，代表對於孫中山而言，民主國家資本主義還是他的理想點。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並不以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爲依歸，而是主張國家在產權和政策上的高度介入，認爲這樣才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在圖 1 中中華民國有三個標點（ROC 1, ROC 2, ROC 3），代表大陸時期（特別是黃金十年）、威權台灣與民主台灣的三個階段。ROC 1 是以 Sun 2 爲理想的，但是由於受到當時國家力量有限的拘束，因此標爲（1.5, 1.5），也就是有限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ROC 2 是在台灣重建的中華民國，不但政治上加強控制、在經濟上也實現了大陸時期所無法實踐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包括土地改革與扶植私人企業發展，因此由 ROC 1 的（1.5, 1.5）向右上角移動到（2.0, 2.0），也就是典型的東亞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位置。至於 ROC 3 則是民主化後的台灣，一方面在政治上放棄了一黨統治，實行了民主政治，並且出現了多次的政黨輪替，在經濟上也放棄了國家掌控經濟的許多重要手段，解開對於市場的管制、放任財團的發展、讓金融國際化與自由化，因而大量減少了國家對於經濟的控制力。因此 ROC 3 在座標圖上的位置便由（2.0, 2.0）向左下方移到（1.0, 1.0）。這樣的位置在政治層面上固然符合孫中山的最終理想，但是在經濟層面上卻與孫中山高度防範資本主義流弊的主張明顯地有所不同。最後在圖 1 中有兩個中共政權的標點：PRC 1 與 PRC 2，分別標誌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在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發展。其中 PRC 1 是代表毛澤東時期的極權狂飆與國家社會主義，其標點是在（3.0, 3.0）。到了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大陸逐漸引進市場，然後放鬆所有制，最後從市場社會主義演進到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放鬆的同時，中共的政治體制並沒有經歷結構性的改變，黨國對於社會的控制仍然牢固，只是在制度化與政治繼承上做了改革，增強了穩定性，並以更有彈性的方式來對應社會日增的要求。這樣的政體表現了後極權的特色，在搭配上新的經濟體制後，出現了「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體系，其位置是在（2.5, 2.0），也就是從原先的 PRC

淡江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向左下方移動，但是在經濟面向上移動地較多。

圖 1　孫中山思想與兩岸發展模式的走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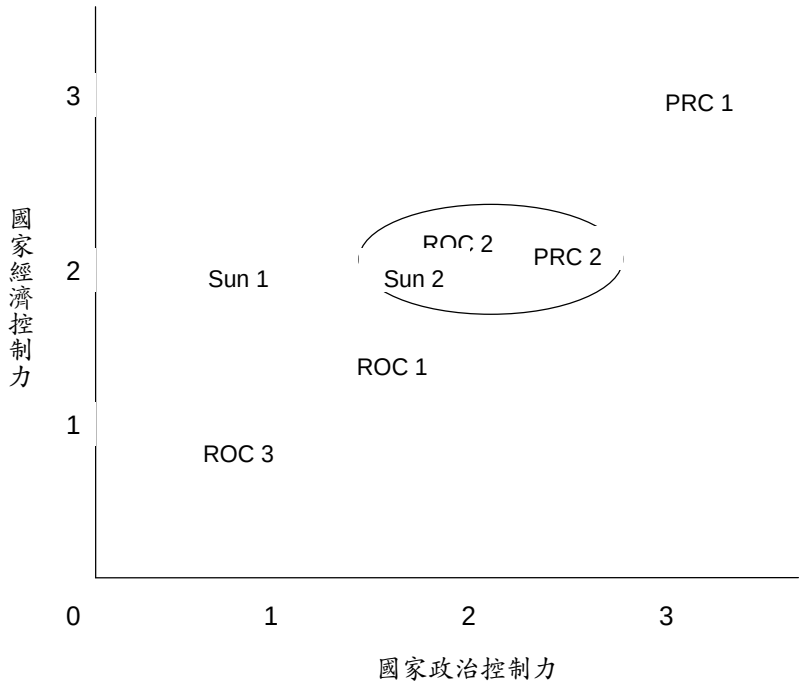
在標誌出三類思想與發展模式的演化趨勢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 Sun 2、ROC 2 和 PRC 2 之間形成了一個群集，其彼此之間的距離小於圖上任兩個其他點之間的距離（圖 2）。這代表了孫中山的晚期思想、威權台灣和今日的中國大陸在政治與經濟的面向上有高度的近似性。此一發現並不令人意外，因爲在政治上三者都主張以黨治國，只是孫中山和中華民國的威權體制具有手段性和暫時性，而中共的後極權體制卻沒有共黨還政於民的退出機制。在經濟上三者更有高度的重疊性，蓋三者均不接受西方市場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的主張，而認爲國家在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福利上應該採取強勢介入的態度，但是主要是調控性質，而不是否定私有產權。三者都認爲國家應該掌控制高點，同時保障和鼓勵私人的經濟活動，並以國家協調於公私部門之間。[43] 在三者之中，中國大陸是最後才進入此

[43] 關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台灣過去的發展途徑類似，參見鄭竹園（20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踐領域，其官式思想仍然落後，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實際的發展，早已經超出社會主義的範疇，而進入資本主義。只是曾經以社會主義爲最高理想目標的中國共產黨仍然獨攬政權，此蓋爲中國大陸宣稱其仍爲社會主義體制的唯一理由。

圖 2　發展模式的匯合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固然獨特，也多被認爲難在其他國家重複，但是其走向其實與當年孫中山爲中國所綢繆的發展模式、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獲得政治穩定後所採行的政經體制愈益相合，並與在東亞地區所普遍採行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高度近似，這些都是中共政權長期試錯、累積經驗的結果，並不可視爲偶然。今日的中國大陸，正一步步走入台灣的過去，並以十數倍的規模重製當年的台灣奇蹟，而展現對全世界的影響力。中國模式其實爲當代東亞模式最新與最強大的力量展現，已浸浸然取得了和歐美民主市場資本主義分庭抗禮的地位，構成了對西方軟硬實力的挑戰。

淡江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則今日的中國大陸是否可能繼續步台灣之路，而由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轉移到民主市場資本主義呢？如果大陸朝此一方向發展，則兩岸間不僅在發展經驗上已經高度重合（中國大陸已經走入台灣的過去），在現實制度上也將出現趨同，而可能對改善兩岸關係產生根本的影響。但是中共的後極權體制有極強的韌性，已經證明可以度過各種政治和經濟的挑戰（如天安門事件、東亞金融危機、國際金融海嘯），因此難以逆料後極權發展主義在中國會如何演化。在歷史上，不論是蘇東的後極權共產政權、或是東亞的威權發展國家（也就是中式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的兩個根源），大都走向了西方式的民主體制，並且接受了自由經濟和全球化的規範。作爲蘇東和東亞混合體的中共政權，是不是能夠走出自己的道路，還是僅僅是延緩了向西方靠攏的時間，或是可以在西方所佈置的政經舞台上，擷取西方的制度，但是成就中國的霸業，成爲世界上最大的新興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力量呢？在這裡，過去的經驗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思考起點。

如果細細觀察過去孫中山思想的轉折、以及中華民國和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遷，我們可以發現原初理念、學習試錯、經社發展和國際環境是四個主要的影響因素。孫中山基於對歐美的觀察和對中國的瞭解主張民主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始理念。然而革命的失敗促使他在晚期轉而主張威權國家資本主義（Sun 1 → Sun 2），其中的關鍵便是在當時中國環境下的學習和試錯，讓他相信只有集中權力、以黨治國才能消除反對革命的勢力，並且透過政治教育讓中國人民熟悉民主，以爲下一個階段的憲政鋪路。中華民國的制度變遷始自孫中山晚期所主張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但是由於受限於當時大陸的形勢，因此只能部分實現。到了國民黨敗走台灣後，失去大陸的經驗教訓成爲制度變遷最主要的動因，而原有的意識型態和國際環境也發揮了作用，結果是鞏固了威權國家資本主義（ROC 1 → ROC 2）。到了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之時，主要是受到快速經社發展的影響，並且配合著國際壓力與原始理念的彈性，促使台灣向民主化的方向轉型，而這個趨勢也無可避免地侵蝕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帶進了市場資本主義的力量（ROC 2 → ROC 3）。在中國大陸，學習與試錯是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領導人推動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原因。由於深信「發展是硬道理」，大陸的經濟從國家社會主義轉向國家資本主義，而政治上也從極權主義透過制度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科學化與物質化走向後極權主義（PRC 1 → PRC 2）。最後的結果便是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或稱「中國模式」。現在我們要瞭解中國大陸的體制是否可能民主化與市場化，而走上台灣的道路，分析的重點便是在原始理念、學習試錯、經社發展和國際環境這四個面向當中，是否有足夠的壓力驅使中共政權轉向，或導致現有的體系崩潰，而由民主的政體取代。

中共的原初理念與意識型態和國民黨不同，缺乏向民主轉型的內在機制。這是因爲國家社會主義被懸爲終極理想，而中國共產黨的專政又被視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所以只要社會主義的堅持不變，共黨的特殊統治地位便無法動搖。這也是所有的前共產國家一旦民主化，就無法持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因。就學習試錯而言，中共已經在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當中找到了富國強兵、躍登世界舞台的金鑰，因此單就對富強的效用而言，中共缺乏放棄專政、實行民主的動機。而以中國之大、成長之速，國際環境的壓力所能夠產生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推動中國大陸向民主轉型的主要動力來源就只可能是本身的經社發展。在這裡有一個關鍵，就是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遷和能力增長的相對速度。在快速經濟發展的情況之下，中國大陸的後極權發展體制受到極大的壓力，也出現了自由化和多元化的趨勢。然而如果此一趨勢在速度上落後於中國大陸能力的增長，以致於中國在後極權發展模式的框架內逐漸追趕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的經濟強權，則中式的後極權發展主義本身定然會成爲發展典範（即日漸風行的「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造成制度合法性大爲增加，制度彈性也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大陸的能力增長速度趨緩（不論是由於生產因素供給的減少、價格的增高、成長的瓶頸、生態的惡化與反噬，或是由於國際保護主義的興起、世界經濟局勢的波動、出口的衰退等），而各種內外壓力促使後極權發展體制以較快的速度自由化，則中國有可能走向完全的東亞模式，從全世界最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轉成最大的新興民主體制，一如過去台灣所走過的軌跡（White, 1993；Dickson, 1998）。這樣看起來，制度變遷和能力增長的相對速度將是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重大關鍵，也是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是否會持續主宰中國命運的決定性因素（吳玉山，2007）。

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孫中山的思想在中華民國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曾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產生了重要的作用。[44] 在中國大陸未來制度變遷的過程當中，孫中山的理念也有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由於孫中山是大陸所尊崇的政治思想家，又有當年「聯俄容共」、「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因此當大陸思考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制度變遷時，可以將孫中山的理念視爲「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自由主義」，則其將比任何一種其他的自由主義更易於爲大陸所接受。另一方面，又由於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又是兩岸都認同的政治領袖，接受他的理念可以成爲兩岸制度趨同的便利基礎，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接受孫中山的民主自由主義會對大陸帶來額外的巨大價值。即使孫中山的思想對於大陸的制度變遷沒有帶來實質的影響，只要大陸的經濟發展帶動了社會動員和政治動員，擴大了民眾參與政治的要求，並迫使中共進行自由化的改革，甚至造成現有體制的崩潰，以及民主政體的建立，則大陸的制度還是客觀上走向了孫中山的理想點，並且和台灣趨同。總體而言，中國大陸的體制變遷主要將由其經社發展和國家能力所決定，不過孫中山的理念和台灣的發展經驗還是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如果兩岸在數十年的迂迴曲折和學習試錯後，能夠在孫中山的理念上做制度的匯合，則更可彰顯出這位中華民國國父百年前的識見與理想。這樣的情景，從現在中國大陸和兩岸關係快速發展的情況看起來，絕非渺不可想像。

---

44 孫中山思想在中華民國的制度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第一是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 ROC 1）便是孫中山後期的制度偏好（包括政治上的黨國訓政，與依靠國家資本主義來發展經濟，也就是 Sun 2）；第二是當國民黨在台灣重建政權，鞏固社會控制時（ROC 1 → ROC 2），孫中山的思想（也就是國民黨的意識型態）、美國所支配的外在形勢，和有限的國家能力使得國民黨沒有試圖建立管控一切的極權體系，而是實質上重回以黨治國的訓政制度，但是孫的思想對於這個威權體系只可能給予工具性與階段性的支持，而對於民主的終極價值則始終沒有放棄，在國民黨的思想教化當中，民主還是最終目標，它僅是在特殊環境（動員戡亂時期）之下被暫時凍結了；第三是當蔣經國過世、國際壓力紛至沓來，而社會反對力量不斷增長時，國民黨較爲容易地進行了民主改革，這和其意識型態始終將民主懸爲終極價值，並替體制轉換提供了出路有一定的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Anderson, Perry 著，章永樂、葉蓁譯，2011，〈兩場革命〉，《思想》，18: 149-196。

丁學良，2010，〈「中國模式」爲何不好推廣？〉，《社會觀察》，12: 103。

丁學良，2011，《辯論「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牛廣泰，1982，《民生主義學理與運用研究》，台北：黎明。

王紹光，1994，〈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吳光國（主編），《國家、市場與社會：中國改革的考察研究，1993 至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19-32。

王紹光，2009，〈如何摸著石頭過河？－農村醫療融資體制的變遷〉，潘維（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603-630。

王紹光，2010，〈體制自覺與體制自信〉，《社會觀察》，12: 81-82。

王紹光、胡鞍鋼，2000，〈重新認識國家的作用〉，王紹光、胡鞍鋼（主編），《政府與市場》，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頁 1-20。

王爾敏，2011，《思想創造時代：孫中山與中華民國》，台北：秀威。

王　輝，1998，《漸進革命：中國經濟改革之路與人力資產》，台北：致良出版社。

王曉波，2003，《孫中山思想研究》，台北：問津堂。

史正富，2010，〈中國式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社會觀察》，12: 91-93。

朱雲漢，2009，〈中國模式與全球秩序重組〉，潘維（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603-630。

江金權，2007，《「中國模式」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解析》，北京：人民出版社。

吳玉山，1995，《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大。
吳玉山，1996，《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
吳玉山，2007，〈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頁 209-335。
吳玉山，2011，〈「兩場革命」與中國模式〉，《思想》，18: 197-218。
吳玉山、林文程、江水平，1995，《後鄧時期對大陸及臺灣的震盪》，台北：國家發展文教基金會。
吳敬璉，2010a，〈讓歷史照亮未來的道路：論中國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趙劍英、吳波（主編），《論中國模式（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601-616。
吳敬璉，2010b，〈「中國模式」禍福未定〉，《社會觀察》，12: 95-96。
吳敬璉、林毅夫、蔡昉、李周、李曉西、張宇、楊瑞龍、姜洪、李建德、張軍、孫來祥、李波、薩克斯、梅俊傑、傑拉德亞當斯、羅伯特 M 安格、崔之元，1996，《漸進與激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宋魯鄭，2010，〈中國模式創造人類史上最大奇蹟〉，《社會觀察》，12: 84-86。
李玉彬，1974，《民生主義經濟研究》，台北：黎明。
李國鼎，1995，《台灣的經濟計畫及其實施》，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李國鼎，2005，《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台北：遠流。
李劍農，1980，《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沈雲鎖、陳先奎，2007，《中國模式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林文斌，2008，〈台灣發展型國家的調適或轉型？政府、金融與企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關係的考察〉，《政治科學論叢》，37: 95-150。
林毅夫，2004，《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林毅夫、姚洋編，2006，《中國奇蹟：回顧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俞可平，2010，〈「中國模式」並沒有完全定型〉，《社會觀察》，12: 95。
姜新立，1998，〈由共產主義到後共產主義－孫中山與馬克思的理論對話〉，陳俊明（編），《挑戰與重構－中山先生思想與當代社會思潮的對話》，台北：革命實踐研究院，頁 1-61。
柯爾奈（Janos Kornai），2010，〈根本沒有「中國模式」〉，《社會觀察》，12: 102。
韋傑廷，1991，《孫中山民生主義新探》，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孫治民，1984，《國父的政黨理論》，台北：黎明。
徐思彥，2000，〈孫中山的政黨觀〉，「第二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6 月 2-3 日），台北：國父紀念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中華民國孫文學會、三民主義教育學會。
徐高阮，1963，《中山先生的全面利用外資政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04》，台北：五南。
崔之元，1997，〈導言：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挑戰〉，甘陽、崔之元（編），《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1-39。
張益弘，1997，《孫學體系新論（下冊）》，台北：怡然書舍。
張榮豐，2009，〈對中國經濟發展策略之探討〉，劉孟俊、李揚（編），《中國大陸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頁 1-30。
張維為，2010，〈「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中國模式〉，《社會觀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 76-79。

盛　洪，1995，〈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盛洪（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頁 1-15。

許紀霖，2010，〈慎提中國模式〉，《社會觀察》，12: 101-102。

陳儀深，1985，《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陳濟民，1973，《民生主義論集》，台北：正中。

童世駿，2010，〈中國模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社會觀察》，12: 79-81。

黃光國，1988，《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台北：巨流。

黃明同、盧昌健，1996，《孫中山經濟思想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黃　彥編註，2008，《論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葉尚志，1976，《民生經濟學－國父民生思想之理論體系》，台北：三民書局。

廖斗星，1969，《民生主義之研究與實踐》，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趙劍英、吳波編，2010，《論中國模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趙穗生，2009，〈中國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現代化模式？〉，潘維（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281-313。

劉小楓、林立偉編，1998，《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國光，201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探索與創建〉，趙劍英、吳波（主編），《論中國模式（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78-589。

樊　綱，1995a，〈論改革過程〉，盛洪（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頁 35-63。

樊　綱，1995b，〈公共選擇與改革過程〉，盛洪（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頁 162-1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樊　綱，1998，〈中華文化、理性化制度與經濟發展〉，劉小楓、林立偉（編），《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67-82。

歐陽日輝、李佳，2009，〈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鄒海濤、歐陽日輝等（著），《新中國經濟發展 6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47-368。

潘　維編，2009，《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

鄧正來，2010，〈中國模式的精髓－生存性智慧〉，《社會觀察》，12: 81-82。

鄭永年，2010a，〈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什麼〉，《社會觀察》，12: 87-88。

鄭永年，2010b，《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鄭竹園，1994，《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互動》，台北：聯經。

鄭竹園，2000，《大陸經濟改革與兩岸關係》，台北：聯經。

蕭功秦，2001，《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蕭功秦，2008a，《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北京：新星出版社。

蕭功秦，2008b，《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台北：致良出版社。

蕭功秦，2010，〈中國模式的形成及其前景〉，《社會觀察》，12: 97-98。

瞿宛文，2009，〈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49-93。

魏　萼，1981，《民生主義經濟學》，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魏　萼，1993，《中國式資本主義－台灣邁向市場經濟之路》，台北：三民書局。

二、英文部分

Amsten, Alice H. 1979.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5(3): 341-379.

Baek, Seung-Wook. 2005.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5(4): 485-498.

Bergère, Marie-Claire. 1998. *Sun Yat-sen*. Trans. Janet Lloy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Bruce. 1998.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Bruce. 2011. "Who Consents to the 'Beijing Consensus'? Crony Capitalism in China."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eds. S. Philip Hsu, Yu-Shan Wu, and Suisheng Zhao. New York: Routledge, 189-203.

Dittmer, Lowell and Yu-Shan Wu. 1995.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47(4): 467-94.

Fischer, Stanley and Alan Gelb. 1991. "Issues in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Economies." In *Reforming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Initial Results and Challenge,* eds. Vittorio Corbo, Fabrizio Coricelli and Jan Bossak. D.C.: The World Bank, 309-335.

Fischer, Stanley, Ratna Sahay, and Carlos A. Vegh. 1996. "Stabilization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Early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2): 45-66.

Freedom House. 2011.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elective Data from Freedom House's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D.C.: Freedom House.

Friedrich, Carl J.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1956.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egor, A. James. 2007. *Marxism, China, & Development: Reflection on Theory and Reali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Hayek, Friedrich August. 2005. *The Road to Serfdom*. New York: Routledge.

Hsu, S. Philip, Yu-Shan Wu, and Suisheng Zhao. eds. 2011.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New York: Routledge.

Johnson, Chalmers.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Chalmers. 1985.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 and Future,* eds. Robert Scalapino, Seizaburo Sato, and Jusuf Wanand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3-89.

Kennedy, Scott. 2011. "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eds. S. Philip Hsu, Yu-Shan Wu, and Suisheng Zhao. New York: Routledge, 27-44.

Kopstein, Jeffrey and Mark Lichbach. 2005.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ests, Id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2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Keun, Donghoon Hahn, and Justin Lin. 2002. "Is China Following the East Asian Model?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erspective." *The China Review* 2(1): 85-120.

Lim, Haeran. 2009.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s: Financial Reform in Korea and Taiwan." *Asian Perspective* 33(1): 75-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nebarger, Paul Myron Anthony. 1973. *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sen: An Exposition of the San Min Chu I*. Westport: Hyperion Press.

Linz, Juan José and Alfred C.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eymour M.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inns, John. 2001. "Of Miracles and Mode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6): 1025-1043.

Murrell, Peter. 1991. "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Underp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4): 59-76.

Nolan, Peter. 1995.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talinism*. London: Macmillan.

Oi, Jean.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1): 99-126.

Pang, Chien-kuo. 1988.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aiwan Ca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rown University, RI.

Pang, Chien-kuo. 1990. "The Stat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Since 1949." *Issues and Studies* 26(5): 11-36.

Ramo, Joshua Cooper.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Sachs, Jeffrey D. and Wing Thye Woo. 2000.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4:1-50.

Schiffrin, Harold Z. 1970.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lay, Ben. 1994. “Rapid versus Gradual Economic Transition.” *RFE/RL Research Report* 3(31): 31-42.

Weiss, Linda. 2003. “Guiding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Roles for Old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ed. Linda Weis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5-270.

White, Gordon. 1993.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ng, Joseph Wong. 2004. “The Adap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3): 345-362.

Wu, Yu-Shan. 1994. *Compara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Mainland China, Hungary, the Soviet Union, and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Yu-Shan. 1996. “Away from Socialism: The Asian Way.” *The Pacific Review* 9(3): 410-425.

Wu, Yu-Shan. 1997. “Taiwan’s New Growth Pattern.” In *Expanding U.S.-Asian Trade and Investment: New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ed. Claude E. Barfield.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145-174.

Wu, Yu-Shan. 2007.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47(6): 977-1001.

Wu, Yongping. 2004. “Rethinking the Taiwa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177: 91-114.

Zhao, Suisheng Zhao. 2011. “The China Model of Development: Can it Replace the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eds. S. Philip Hsu, Yu-Shan Wu, and Suisheng Zhao. New York: Routledge, 45-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un Yat-sen Thoughts, the Centenni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Development Model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Macro Analytical Framework

*Yu-Shan Wu**

Abstract

It would do no justice to a revie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ROC) centennial development if a focus were cast exclusively on the ROC's early perio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authoritarian era in Taiwan, or the two decades after democratiz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a broad overview of the century of the Republic by putting the ROC's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ointing out the mechanisms of transitions, and capturing the grand trends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e observe three subjects: Sun Yat-sen's thoughts, the practice of the ROC, and the post-1949 development on mainland China. These three produce seven observation points on a two-dimensional map laid out by the axes of state political control and state economic control. Three political systems are identified on the political axis: liberal democracy, 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 as well as three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s/economic systems on the economic axis: market capitalism, state capitalism, and state socialism, based on different level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 by the state. This gives rise to nine institutional combinations against which the seven observation points can be located. When state political control matches

*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Jointly Appoint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yushanwu@gate.sinic.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conomic control, the institutional combination is most stable. This is followed by high political control cum low economic control. The least sustainable combination is when low political control is paired with high economic control. On the institutional map, Sun Yet-sen's thoughts migrated from democratic state capitalism to author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with the ultimate ideal point remaining unchanged. The ROC shifted from a limited form of author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while on the mainland) to full author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prior to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finally to democratic market capitalism (after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The PRC transitioned from totalitarian state socialism under Mao Zedong to post-total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during the post-Mao, and particularly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Because high political control is paired with low economic control, this system demonstrated considerable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capable of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 posed by a series of politico-economic crises.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s found in Sun Yat-sen's later thoughts, the ROC's authoritarian stage, and contemporary China. The mainland has moved into Taiwan's institutional past. The prospects for further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relative rate of the rise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ompared with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the mainland.

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t-sen Thoughts,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